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 & MODERNIZATION

一九九四年 ● 第五期

歷史系

協人靈以取公基化成而句

遠

既李了喜以有題付統文化文現

代化創刊周歲之慶本系以人字為

易象云久和耳道而王以化年時義

深矣 饒宗頤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

(双月刊)

1994年第5期

总第11期

顾问 匡亚明

主编 张岱年

副主编 许逸民

责任编辑 张世林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编辑者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编辑部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出版者 中华书局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国外代号 BM1250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刊号 ISSN 1004-8618

CN 11-3175/G2

定价 4.00元

弘扬华夏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张承先(3)
也谈“天人合一”

——与季羨林先生商榷……………蔡仲德(8)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有无促进作用……………谢遐龄(17)

原道……………庞朴(24)

董仲舒的正统与大一统论……………邓红(38)

五四新文化与晚清学术传统……………罗检秋(45)

目连与地藏源流关系及文化内涵……………刘祯(54)

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崔永东(64)

明末科技与农业

——从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圈地运动看
中西方科技发展……………曾雄生(71)

《画法大成》题记……………王世襄(82)

●海外“中国学”

儒家传统的历史命运和后现代意义……〔德〕卜松山(84)

●书评

珍贵的文献 丰硕的成果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
交流史》读后……………宋岷(88)

编后……………(96)

CHINESE CULTURE: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A Bimonthly)

No. 5, (1994): CCTM Total(11)

-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of socialism *Zhang Chengxian*(3)
- The correlation of man with heaven again—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Ji Xianlin *Cai Zhongde*(8)
- On the role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play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Xie Xialing*(17)
-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ao *Pang Pu*(24)
- Dong Zhongshu's orthodox and his emphasis on national
unification *Deng Hong*(38)
- The May 4th new-culture and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of
late Qing *Luo Jianqiu*(45)
- Maudgalyayana and Ksitigarbha: their religious connections
and cultural impact *Liu Zhen*(54)
-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ket economy *Cui Yongdong*(64)
- Science and agriculture in late Ming: A contrastive study of
scientific progress in China and West *Zeng Xiongsheng*(71)
- Preface to *An Anthology of Visual Arts* *Wang Shixiang*(82)
- Sinology abroad
- Confucian tradition:its historical destiny and post-modern
significance
..... *Karl-Heinz POHL*(Germany)(84)
- Book Review
- Silk Road-A History of Sino—Persian Cultural Exchanges:*
Precious documentation with rich findings *Song Xian*(88)
- Editorial Postscript (96)
- (顾曰国译)

弘扬华夏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张承先 ·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时代的要求,胜利的保障。

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吸收人类社会发展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既要面向世界、扩大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创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精神文明。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党的十四大精神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的指引下,我国正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现代化建设;到本世纪末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达到小康水平;并为下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发展目标

奠定良好的基础。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本身发展的要求,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

市场经济是进行平等竞争的经济,要求建立起平等竞争的机制和条件。要发扬自立自强、勇于进取、奋力开拓、艰苦创业的精神;要反对特权,反对垄断,不允许搞不正当的权钱交易,破坏机会均等、平等交易的原则。

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要建立起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社会上每个成员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必须认真履行社会分工,进行相互协作,承担起各自应负的社会责任。一定要进行合法经营,公平交易,维护社会各方面的合法权益。要坚决打击各种破坏经济秩序、从事经济犯罪的活动。

●张承先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

市场经济必须是信用经济。要讲求商业道德,实行文明经商。信誉是企业的生命。要守契约,讲信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以质量取胜。在商海畅游中,要以信誉为舟。

总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不能把建立市场经济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看成是互不相关的两个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搞“两张皮”,更不能把两方面分割对立起来。

还应进一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的目标不只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当然,这是中心、是基础;还要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达到社会公正。一定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

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对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改革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则保持了高度警惕。在他的领导下,我们曾不断地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其繁荣的外衣下,包含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西方有识之士,

正为之忧虑,谋求出路。1993年5月下旬,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一次关于《东方伦理道德和当代青少年教育》的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许多西方学者发出的呼声是,“西方出现了道德危机,要向东方来寻找智慧,挽救西方文明”。

新加坡来参加会议的吴德耀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新加坡儒学会主席,东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他提交会议的论文提出:“现代人正面临着自己创造物的危机”,“他创造了财富和物质的充裕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但现代人现在是财富和物质充裕的欲望的奴隶,而不是主人”。他还历述了历史上一些强大帝国由繁荣到衰落的历史过程,进而提出“当今二十世纪的黄昏,有着另一个帝国——美利坚帝国,它似乎在走着以往帝国的老路。美利坚帝国是由人类建立的最强大、最富有的帝国,它同样达到了他的顶点,并走上了下坡路。论财富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论力量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论道德其水准明显的低落”。今天面临的问题是:“现代人将如何脱离自己构造并把自己囚于其中的‘铁笼’。有些人谈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他将判决恶人和好人。好人将升天堂,恶人将入地狱。他们告诫世界正朝这个方向走,最后审判之日为期不远了。有些人谈到现代摩西,他将为今天的现代社会带来一批新的‘十诫’。有些人——75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于1988年1月在巴黎会晤。他们宣称,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那么他就不得不在时间上退回到2500年前去,领会孔夫子的智慧。”吴德耀博士最后谈到孔子的大同思想。他说:世界之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模范秩序可以铭记在以下107个中国文字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他认为这样美妙的秩序是全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理想的最好的概述。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于1992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发表了一次公开讲演，题目是《西方民主和人权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他提出：我们亚洲人到美国去会遇到许多情况，感到迷惑和不安。(1)社会治安失去控制，暴力、吸毒、枪杀、强奸各种犯罪频频发生。(2)贫富悬殊，一方是亿万富翁，一方是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3)个人权力太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影响到社会整体利益。

李光耀、吴德耀的看法是东方政治家的看法。美国有些有识之士也不讳言。美国前总统卡特在1993年6月14日接受《今日美国》记者采访回答美国是否存在人权问题时，答称“当然存在。我不是批评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确有两个美国，——两个亚特兰大，两个华盛顿，两个芝加哥等。一个比较富裕，另一个贫穷，犯罪率很高，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很多”。华盛顿只有70万人口，去年头十个月有370人死于暴力和凶杀。今年1月20日，美国东部大风雪，气温降到零下20度，华盛顿冻死了130多人。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知名学者吴德耀博士谈到对新加坡的治理时，都强调要发扬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抵制西方不良文化思想的渗透。东方具有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国家，像新加坡等，儒家思想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许多西方学者也在研究东方文化传统对他们的影响。应当指出，许多西方学者企图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来解决西方的社会危机是不可能的。西方社会的病态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根本出路只能

是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许多西方学者虽不赞成、甚至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们确实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病态，正在谋求解决。他们从东西方文化对比研究中，也看到了东方文化传统的特点和优点，有值得西方学习的方面。在西方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停滞，东亚经济都呈现惊人的增长的情况下，“东方话题”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的兴趣，成为研究的热点。

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对东西方社会情况应该说是都了解的。他于1993年8月29日在与记者问答录中谈到：“中美文化传统的分别是明显的。中国文化是个人服从社会。儒家礼教也好，家族观念也好，都是要求‘个人以社会为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受到很大的抑制和约束。美国正相反，在个人和社会发生矛盾时，往往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这有利于激发个人的主动进取精神，整个社会有活力；但这种观念也导致滥用自由，现在美国社会乱象丛生，不能说与此无关。有人甚至说：美国将来就毁在这个‘自由’上。旅美华人处在两种文化的前后夹击中，要审慎地分辨两种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兼取双方之长，千万不能把自己的长处丢了，去学人家的短处。前几年国内有一部电视片，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帐全部算在传统文化的头上，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却一味推崇倍至，我当时就不敢苟同。”据杨振宁教授的分析，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美国传统看法与中国传统看法确实有很大区别。

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个人以社会为重”，先义后利，先公后私，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公利。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合理的原则；抛弃这一原则，承认或鼓吹社会每一个成员可以不顾公共利益随心所欲地发展，将使正常的社会秩序无法维护，使社会生产生活陷于混乱。

儒家思想还要求个人独立人格与社会义务的统一。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同时儒家思想又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确实起了伟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又受到历史的局限,带有封建性。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公利实际上是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要求。要人民服从这样的社会公利就不可避免地压制劳动人民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封建社会存在着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封建社会强调的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抹杀了个人的独立性,压制了人的发展。在反封建斗争中,在推翻封建压迫的同时对封建文化进行批判,剔除其封建性糟粕,使人民从封建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是完全必要的。但对传统文化的优良成果、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则要细心保护发扬,不能丢弃。

社会发展到近代,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封建等级制度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法则支配着社会生活。人们从对人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平等的、自由人的身份进行市场交换、公平竞争。作为对中世纪等级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反抗,兴起了西方的个人主义,提出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观念。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和出发点来观察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本主义精神的发扬,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无疑是一个进步。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性,使人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人们发现,资本支配一切,个人自由实现的程度,取决于拥有金钱的多少。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发展也日益显露出负面的影响,人们处处事事从个人

出发,缺乏对社会、对他人、对环境的关心,缺乏社会责任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引起了愈来愈多的社会问题,成为产生种种罪恶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显著暴露,引起人们的不满,使人们不能不重新思考。随之,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兴起。社会的发展要求消灭阶级剥削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经济利益的对抗,从而使社会上一切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要继承发扬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既要批判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要批判继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把东方文化传统中的整体协调精神和西方社会中的个人进取精神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建设高度的社会文明。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人不只是自然的人,还是社会的人。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个人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克服“左”的观点,注重个人利益的发展,注意发展人的个性与特点;结合经济体制改革要进行全面改革,积极发扬竞争、激励和选择机制的作用,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但同时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起来,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统一起来。我们不否定个人利益,但要义利结合,取之有道。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三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要批判继承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毛泽东同志又说“对外国的文化,排斥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的文化”,“中国应当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思想,过去我们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得很不够。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得多,对优秀文化成果继承发扬工作做得少。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仍如过去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对西方文化吸收借鉴“做得很不够”。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胆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1.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科学研究,分清“精华”和“糟粕”。要重在建设,在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上下苦功夫、下硬工夫。确实经过深入研究,产生一大批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写出一批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好教材,培养出一大批“学贯古今”、“中西兼通”的人才。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大学准备成立国学研究院,全国有条件的大学均应建立相应的研

究机构。

2. 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要根据社会的发展,赋予时代精神、时代要求,突破其历史局限性,进行发展和创新。发扬东方文化传统的优良成果,要与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融合起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要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特点。

3. 把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结合起来,赢得对资本主义相对比较的优势,创造出世界更高的现代文明。

4. 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建立新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价值观上,由东方古代传统道德的“个人以社会为重”到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又发展到进行新的合理追求。现在西方又提出向东方学习。历史的发展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人的发展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越来越清楚,为建立科学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奠定了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有些地方已注意加强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商业文化、街道文化、乡村文化等的建设,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在实践中,要以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为准则,明确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建设一整套新的社会道德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也谈“天人合一”

——与季羨林先生商榷

□蔡仲德

季羨林先生认为,“天人合一”命题不仅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而且关系人类发展前途,故于最近撰文就这一命题提出新解,并对冯友兰、侯外庐、杨荣国、钱穆诸先生的有关见解作出评论(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号所载《“天人合一”新解》)。对此,我愿提出管见,求教于季先生。

一、关于对“天人合一”命题的理解

季先生认为,所谓“天人合一”,“人”就是“我们这一些芸芸众生的凡人”,就是“我们人类”,“天”就是大自然,“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同大自然交朋友”。在此,季先生并非另立新说,而是对历史上的命题作出阐释,这就有必要考察其阐释与该命题的实际内涵是否相符,与前人的思想实际是否相符。

“天人合一”思想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思想在春秋时期即已萌生。但孔子罕言天道,其思想重在现实人生与社会,此可谓重“人”轻“天”;《老子》提出“道”的范畴,以天道的无为否定人的有为,否定人的智慧及

其产物——文化,此可谓以“天”灭“人”;墨子既推崇“天志”,又强调“非命”,其“天”、“人”思想矛盾而未统一;至邹衍创立阴阳学派,以“五德终始”解释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沟通天人关系,建立时空统一、包罗万象的宇宙图式,“天人合一”的思想才得以出现。此后“天人合一”思想便大为盛行,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而邹衍的著作已亡佚,其思想可于思孟著作见其端倪,于《吕氏春秋》之“十二纪”各纪首篇及《圜道》、《应同》诸篇知其概貌。故本文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考察,拟始于《中庸》与《吕氏春秋》,而及于董仲舒与宋明道学家的有关论述。

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认为人性、物性皆为天地之所赋予,人能通过尽己之性进而尽万民之性、万物之性,进而“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思想就已带有“天人合一”色彩。但这尽己之性以尽人之性的并非芸芸众生的凡人,而

是君临天下的“圣人”，故朱熹注此段文字曰“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中庸》又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祯祥”是“天”之示人以福，“妖孽”是“天”之示人以祸，“天”能示人以祸福，则可知其虽还不是人格神，却也已不是大自然。

《吕氏春秋》之《应同》篇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制乐》篇说“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此即阴阳学派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其中的“人”是“帝王者”，其中的“天”则已是具有意志，能行赏罚的人格神，而不是大自然。

汉代董仲舒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认为“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政，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天之所大奉使之王，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对贤良策一》）。其所谓“人”是“人君”，其所谓“天”则是“仁爱人君”而非人力所能致的神，其神学色彩极为鲜明。

宋明道学气学一派之张载继承《中庸》思想，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认为“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横渠易说·系辞上》），又认为“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知，然知之之理过于耳目心知”（《正蒙·天道》），“世人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桎梏其心，其视天下万物无一非我”（《正蒙·大心》）。可见其所谓“天”仍有意志，其所谓“人”仍指“圣人”。

宋明道学理学一派之朱熹既据《中庸》之旨说“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又据《大学》之旨说“盖自天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四书章句集注》）。此其“天”更有意志，此其“人”更集“君”、“师”（即“圣”）于一身。

从思孟学派到宋明道学的有关论述表明，“天人合一”命题中的“人”并非泛指“芸芸众生的凡人”，而是特指先知先觉的“圣人”；“天人合一”命题中的“天”并非今日所谓“大自然”，而指有意志，有喜怒，能赏善罚恶，为民立君师的神或准神。所以程颢曾一语道破天机，说“君道即天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一）。由此也就可知，从思孟学派到宋明道学，人们之所以提出“天人合一”，其目的不在“讲人与大自然合一。……同大自然交朋友”，而在宣扬“君权神授”，即借“天”的威严维护君权，使“芸芸众生”相信君权出于“天之所大奉使之王”，非人力所能推翻，更在宣扬“天道之大者在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对贤良策一》、《春秋繁露·基义》），宣扬“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朱熹《癸未垂拱奏二》），即借“天”的威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使“芸芸众生”相信其为天经地义，不可违逆，不可动摇。

二、关于对“天人合一”命题的评价

从思孟学派到宋明道学，思想家们提出

“天人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君权、封建伦理的神圣不可侵犯提供理论依据,但其影响则不限于政治、伦理,而涉及各个学派各个领域,其内涵也随之而大为丰富。

这一点在音乐美学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春秋时期,阴阳五行音乐思想认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人“省风”以作乐,人又可以用乐“省风”、“宣气”,天、人、乐以“风”、“气”相通;认为六气、五行、五声“过则为菑”(“菑”,“灾”的异体字)、“淫声六疾”,音乐平和才能使阴阳调和,人心和乐,声不平和则阴阳不调,民离神怒;认为乐通天、人,要求以平和之乐使人际关系调和、天人关系统一的思想此时已经萌生。战国后期,杂家著作《管子》说“昔黄帝以其缓急,作立五声以正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吕氏春秋》据阴阳家与道家思想,以五音配五时、十二律配十二月构成宇宙图式,强调音乐来自自然,与自然相统一,音乐应该像自然那样平和、适中,应该以平和、适中之乐治身治国:“天人合一”音乐美学思想此时已经形成。西汉时期,《淮南子》使《吕氏春秋》的宇宙图式更精致完密,更突出其中数的意义,尤其突出音乐与天道之间的数的联系,认为“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认为音乐能上通九天,沟通天人;《乐记》则更强调音乐能以气沟通天人,使天人互相感应,能直接改变自然状态,直接决定社会政治,故要求音乐“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既使人“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又使“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音乐美学思想此时已经成熟。这种思想在汉代曾泛滥一时,沦为荒诞神秘的谶纬神学。魏晋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音乐美学思想仍带有阴阳五行学说的烙印,“天人合一”、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的和

谐统一始终是人们的追求,阮籍如此,嵇康也如此;儒家、道家如此,佛学也如此;道家如此,其他文人也如此。同时,荒诞、神秘的色彩也依然存在,如朱熹《琴律说》认为“盖散声,阳也,通体之全声也,无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阴也,全律之半声也,受命于人而人之所贵者也。……至其三宫之位,则左阳右阴,阳大而阴小,阳一而阴二。故其取类左以像君,右以像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阳明,故为君子而近君;右者阴浊,故为小人而在远。以一君而御二臣,能亲贤臣,远小人,则顺此理而国以兴隆;远贤臣,亲小人,则拂此理而世以衰乱。是乃事理之当然,而非人之所能为也”,汪烜《乐经律吕通解》认为“人有和气而天地之气感之,天有朕兆而人之音声应之。故武王伐纣,推孟春以至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楚人伐郑,师旷吹律,南风不竞。此亦天人合一自然之理也。……风角鸟占、阴阳家言亦以五声为断,是亦人之气焰有以致之。唯吉凶不僭在人,唯天降灾祥在德耳”。

撇开其荒诞、神秘的一面不谈,应该说“天人合一”命题确实含有人与自然合一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因素。但这并不能用以否认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思想家们的目的是在维护封建君权、封建伦理。维护封建君权与封建伦理是这一命题的本质所在,追求天、人合一则是这一命题蕴涵的合理因素,我们既不应为强调前者而否认后者,也不能只看到后者而无视前者。

季先生还将“天人合一”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认为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则是主张“与自然浑然一体”,“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炼的表述”,“中国固有

的思想中,对鸟兽表示同情的表现,在在皆有”。此说也有待商榷。首先,主张“天人合一”是否就是主张“同自然交朋友”?似乎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董仲舒曾突出地强调“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豢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汉书·董仲舒传》),其思想便与“同自然交朋友”、“对鸟兽表示同情”相去甚远。其次,“天人合一”命题确实蕴涵“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思想,但其中固然有反对与自然对抗,因而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的合理因素,却也有将无意志的自然与有意志的人和社会混同,不是把人与社会当成自然物,就是把自然现象拟人化,因而既不利于认识自然,也不利于认识人和社会的局限。复次,在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中,强调的是“无逆天数”、“必顺其时”(《吕氏春秋·仲秋纪》),即人事(主要是农事)依自然(主要是气候)的变化而行,故其“天人合一”带有媚于神以求福的鲜明色彩,它所反映的是小农经济对自然的依赖性,是生产力低下时祈求“风雨时至”,畏惧“过则为菑”的心理,这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是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而且,古人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是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摹拟,而自然有日夜相继、四时代兴、生死相续等现象,古人便由此得出“天道圜”、“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吕氏春秋》)的循环论结论,认为包括自然、社会一切现象在内,宇宙间的运动变化都是五行相生相克、周而复始的“圜道”,认为这是“天常”,不可违逆,所以人的所作所为都应顺应这种“圜道”、“天常”,保持事物的平衡统一,使之得以正常发展,而决不能违背“圜道”、“天常”,破坏旧的统一以建立新的统一,招致灾祸。这就决定它必然具有保守特性,必然产生以平和为美以不平和为丑的价值取向。

季先生在将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思想比较时,还认为目前全世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威胁人类生存,这种现象的出现“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可”,是推行西方文化,贯彻征服自然方针的必然结果,而挽救的办法则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模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此说同样有待商榷。目前世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是事实,这与西方文化过于强调征服自然确也不无关系。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状况又如何?众所周知,经过数千年,尤其是近数十年的乱砍滥伐,中国的森林资源极为贫乏,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于是便必然出现严重后果。如今年4月西北发生特大沙尘暴,历时7天,横跨3300公里,覆盖100万平方公里,其为时之久、范围之大、经济损失之巨为中外历史所罕见,而其原因,则如5月25日《光明日报》所说,“大风是动力,地面沙漠化与植被稀少是罪魁”。又如四川西部林区本是长江的水源涵养基地、天然保护层,但自1950年以来,长期过量采伐,造成水土大量流失(仅近十年流失的水土即相当于500万亩土地被刮去5寸表土),水量严重失衡(洪水期与枯水期水量相差3—4倍),气候急剧恶化(由阴凉向高温干燥转化),珍稀动植物生息地急剧缩小,致使长江几乎变成第二条黄河,水患频仍,严重影响三峡工程上马(据1993年2月《农民日报》报道)。事实说明,西方存在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严重状况,中国同样存在这一状况,而且还有过之无不及。那么,为什么在提出“天人合一”的中国却出现如此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状况?原因就在于,提出“天人合一”的根本目的不是“了解自然,认识自然”,“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思维方式更不利于“了解自然,认识自然”,故而理论上提

出“天人合一”，实践上却常常严重破坏“天人合一”。既然如此，似乎就应该说，笼而统之地提倡按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办事并不能改变世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状况。

三、关于冯友兰等有关“天人合一” 的见解与世界文化的前途

季先生还在文章中介绍冯友兰、侯外庐、杨荣国、钱穆诸先生有关“天人合一”的见解，加以褒贬，并由此提出关于世界文化前途的看法。

介绍冯友兰先生的见解时，季先生引冯著《中国哲学史》“‘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等语，颇有神秘主义之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简略，不能详也”数句后说，“由此可见，冯先生对孟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没有认真重视，认为‘有神秘主义倾向’。看来他并不以为这种思想有什么了不起”。但三十年代所著《中国哲学史》于上引数句后，写有五百余字的注释，认为“此神秘主义，乃专指一种哲学承认有所谓‘万物一体’之境界。在此境界中，个人与‘全’（宇宙之全）合而为一，所谓人我内外之分，俱已不存。……中国哲学中，孟子派之儒家，及庄子派之道家，皆以神秘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于论张载（张横渠）思想时又说张载“注重于除我与非我之界限而使个体与宇宙合一。……盖就孟子哲学中神秘主义之倾向，加以推衍也”；四十年代，冯著《新原人》认为孟子、张载所追求的境界就是知天、事天、乐天、同天即“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一种区别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的最高人生境界，冯著《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的问题与精神》进而认为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就在于追求这种境界，冯著《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进而认为中国哲学对人生的启示是“改变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使之具

有在最好意义上的最高价值”，达到“个人与宇宙的同一”，“中国若能对未来世界哲学作出贡献，那就是这个公开的秘密”（《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原作为英文，中译者为涂又光）；八十、九十年代，冯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认为这种境界“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是“人类精神生活，在中国的深刻的反思”（见其第十一章《孟轲——儒家思想向唯心主义的发展》），认为儒家所谓“仁”、道家所谓“道”、佛学所谓“涅槃”与“般若”均与“天地境界”即“天人合一”相通，认为宋明道学批判而又融合了佛学与道家，继承而且发展了儒家，是中国哲学的高峰，它追求共相与殊相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追求“同天人”、“合内外”的最高幸福，“这就是道学对于人类理智发展和提高幸福作出的贡献”。因此，说冯先生对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没有认真重视，说他不以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什么了不起，似有断章取义之嫌。

介绍侯外庐先生的见解时，季先生引《中国思想通史》中“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在西周的宗教精神上面加上了一层‘修道之谓教’”一句后说，“看来这一位中国思想史专家，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与欣赏水平，并没能超过冯友兰先生”。而事实是，在侯先生看来，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宗教化的形而上学，邹衍的“天人合一”是循环历史观，连张载的“天人合一”也是一种唯心主义，因而认为对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只能予以否定，他所肯定的则是荀子强调“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天道观。这就可见，侯先生否定“天人合一”，是因为立场、观点不同，而不是因为理解与欣赏水平不高，他关于“天人合一”的见解与冯友兰先生的见解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介绍杨荣国先生的见解时，季先生据1973年杨主编之《简明中国哲学史》说，杨先

生“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关的古代哲学家一竿子批到底”，这“代表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潮”，“代表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御用哲学家的意见”。《简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确实适应了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反人民势力的需要，对所谓“评法批儒”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此而言，说它“代表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潮”似乎亦无可。但1954年出版之杨著《中国古代思想史》就已认定思孟学派为唯心主义而加以否定，认定荀子、韩非思想为唯物主义而加以肯定（此书只论及先秦各家思想），1962年杨主编之《简明中国思想史》又认定思孟学派、董仲舒、周敦颐、程颐、朱熹思想为唯心主义而加以否定，认定荀子、韩非、王充、王夫之的思想为唯物主义而加以肯定。这就可见，“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关的古代哲学家一竿子批到底”是杨荣国先生的一贯思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既不是因为理解与欣赏水平不高（这一点和侯外庐先生相同），也不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也就是说，不是杨先生为迎合某种势力的需要而“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关的古代哲学家一竿子批到底”，而是某种势力出于其政治需要而利用了杨先生“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关的古代哲学家一竿子批到底”的一贯思想。就此而言，说这种思想“代表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御用哲学家的意见”就未免有失公允。

与对以上三位先生有关见解的介绍不同，介绍钱穆先生的见解时，季先生全文抄录了钱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约2000字），认为其中所达到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认识“实在是值得我们非常重视的”。

钱文的要点之一是阐述对“天人合一”的理解，给予全盘肯定的评价，说“离开了人，又何处来证明有天。……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

天命的天人合一观’。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之真相”。季先生不赞成钱文关于“天”就是“天命”、“人”就是“人生”的理解，对钱文等同“天”“人”的基本观点则并无异议。钱文所说“天即是人，人即是天”就是季先生所说“与自然浑然一体”，本文已经指出，这种思想存在将有意志的人与无意志的天混为一谈的局限，既不利于认识人与社会，也不利于认识自然，全盘肯定这种思想显然不妥。

钱文的要点之二是认为“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今后的世界文化“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季先生对此不仅没有异议，而且极为赞赏，赞赏之余，还加以发挥，认为只有主张“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能挽救已经衰落的西方文化，世界文化的前途则在于“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由西方文化主宰变为东方文化（实指中国传统文化）主宰，认为这叫做“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季先生曾有“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的说法，但“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云云却否定了这一说法）。本文则以为此类观点更有待商榷。

正如季先生所说，“天人合一”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天人合一”命题不仅蕴涵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蕴涵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感性与理性（“肉”与“灵”，“欲”与“理”）的统一，有人因此给它极高评价，认为“天人合一”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追求个体与群体的和谐、整个社

会的和谐,追求人的感性欲求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和谐统一,提倡“爱人”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提倡“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即个体人格的独立性,认为“天人合一”命题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充分肯定了人作为人所应有的意义和价值,而无反人性、反人道、反理性的倾向。本文则认为,在“天人合一”命题中,不仅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真正的和谐统一,而是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还有其他关系也是如此。“天人合一”确实追求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整个社会的统一。为追求社会的统一,它倡导“爱人”,确实带有一定的人道精神,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其“爱人”是上对下的恩赐,是为了使民“易使”,为了达到维护等级统治与剥削的目的,所以“爱人”与杀人可以并行不悖,此即孔子所谓“宽猛相济”。为追求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它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感性欲求,但由于强调“私”与“公”的对立,强调“利”与“义”的对立,这种肯定必然是以礼所规定的等级制度与伦理纲常为限而决不允许有任何突破(所以从孔子强调“克己复礼”,要人们视听言动思皆合于礼,宋儒强调“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其实质是以封建礼制抑制人的感性欲求,而不是什么人的感性欲求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和谐统一。它确实也宣扬“匹夫不可夺志”,宣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似乎是在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但它既然明确规定个人必须“克己复礼”,必须自觉自愿地窒息一切非礼的欲念,使自己的视听言动思都合乎礼的规定,那么宣扬“匹夫不可夺志”,宣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无非是要个体为礼制而献身,为等级统治而献身,为统治集团的私利而献身,这就不仅不是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而是恰恰要否定以至灭绝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使之成为

死心塌地的奴才。它确实也肯定人作为人所应有的意义与价值,但这种肯定同样以维护礼制、维护礼制所规定的等级关系与伦理纲常为前提,因此它只讲个人的义务,不讲个人的权利,这就远远不是对人作为人所应有的意义与价值的充分肯定。它规定人的视听言动思,人的一切都必须合乎礼教不得违背,规定人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伦理纲常而不得违背,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宣扬“仍旧贯”、“攻异端”,宣扬愚民(儒、墨、道、法一无例外),以至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一切无疑都不合人性、人道、理性,而正是十足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理性。总之,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命题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对自然的顺应为基础,其间不存在真正的和谐统一;在这一命题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持严格的等级制度为基础,其间只有下对上的顺从,上对下的恩赐,也不存在真正的和谐统一;在这一命题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维护礼制及其等级制度、伦理纲常为基础,其间只有群体对个体的压制、个体对群体的屈从,而不存在个体的意志自由与人格独立,也就不存在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在这一命题中,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同样以维护等级制度、伦理纲常为基础,同样不存在真正的和谐统一。因此“天人合一”思想确实含有某种人道精神,但这与以人人平等、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不可同日而语,说它“富于人道主义精神”也并不妥当。还有一种见解,认为“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种符合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高度自由的境界,一种审美的境界。此说同样不妥。“天人合一”境界中的人必须顺应自然,那就无超越、自由之可言;“天人合一”境界中的个体必须屈从群体,那也无自由可言。道家要人们像“天”那样无知、无欲、无情、无为,这是以“天”为本,以“天”灭“人”,其“与道为一”的境界是虚幻

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儒家要人们“克己复礼”,一切服从于礼,这是以礼为本,以礼灭人,其“曾点之志”、“孔颜乐处”,以及“与天地参”、“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晋人乐广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朱熹所谓“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是带着镣铐跳舞,是奴才式的自由,而更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境界、审美境界不能以礼为本,也不能以“天”为本,而必须以人为本,确立并高扬人的主体性。

以上是就中国文化本身以说明对“天人合一”命题不宜评价过高。如从东、西两种文化的比较及其相互关系来看“天人合一”,则本文以为有必要强调两点。

第一,西方对“天”、“人”关系有见于异,无见于同,注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这确有忽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局限,最终将导致自然的惩罚,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但数百年来,西方文化主宰世界,带来了科学的突飞猛进,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人的解放——从封建束缚下的解放,其“光辉成就”确实“不能抹煞”。东方对“天”、“人”关系有见于同,无见于异,注重“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确有重视人与自然统一的合理因素,但它不利于认识人与自然,使人屈从于自然、个体屈从于群体、感性屈从于理性,同样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此而言,似乎就应该说,东、西两种文化各有短长,二者应互相取长补短,而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改恶向善,改弦更张”,“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第二,提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命题的基础是小农生产、自然经济,它也满足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的需要。西方注重“天”“人”相分、注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随工业生产、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也

满足了建立在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就此而言,东西方两种文化代表了人类认识与思维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今天,人类思维更向前发展,认识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又追求进一步的解放——从物的压迫下的解放,需要的既不是停留于忽视人与自然统一性的阶段,受物压迫的阶段,更不是倒退到与自然“浑然一体”的阶段,受礼压迫的阶段,而是取二者之长,弃二者之短,以建立新的“天人合一”,即打破人顺应自然、人民顺从统治、个体屈从群体、感性屈从理性的旧“天人合一”,而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在个体本位的基础上建立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在感性本位的基础上建立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在此四者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天人合一”——真正自由的、审美的理想境界。

钱穆先生说“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是在1990年。而在此之前70年,梁启超便已在其所著《欧游心影录》中说过,西方物质文明已经破产,中国应承担起以自己的精神文明拯救处于精神危机中的西方人的重任:“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梁漱溟便已在其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过,西方文化使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生了罅隙,使西方人精神上受伤,生活上吃苦,于是就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现在,整整70年过去了,事实又如何呢?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正是在这70年中,尤其是在“最近五十年”中,在西方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掀起了信息革命——把人从脑力